

主 编  
徐 泰 来

(一八四〇—一九一九)

# 中國近代史記

上



徐泰来 主编

# 中国近代史记

上

周谷城题



湖南人民出版社

# 中国近代史记

上

徐泰来主编

责任编辑：李建国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益阳美术印刷厂印刷

\*

198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125

字数：459000 印数：1—2000

ISBN7—217—00656—2

K·86 定价：9.60元

湘人：89—8

(内部发行)

## 序

前不久，我在《光明日报》上提出，“把照镜子的历史观稍稍扩大一点”，并说今日有一些历史书，只是供翻检之书，不是阐明历史自身发展的可读之书。然则，要阐明历史自身发展的大势，如何而后可呢？曰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把照镜子的历史观扩大一点，把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放在世界现代化中去研究。

我很高兴的是，徐泰来同志主编、国内几十位专家学者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记》，就是这样一部书。它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放在世界现代化中去研究。正因为如此，它阐明了中国近代历史自身的发展过程，把经济开放、引进、改革等的历史过程，说得清清楚楚。它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全书贯彻了生产力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这是本书不同于已往各种近代史书的最根本之处。机器代替人工生产是产业革命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就没有产业革命，就没有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就不能提高；德先生和赛先生也活不长久。真正的现代化仍不可能到来。我们研究近现代历史，应该以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社会各方面的成绩。

《中国近代史记》一书除了叙述中华民族反抗外国列强侵略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外，还实事求是地阐述了中华民族为了生存，

企图使自己也变成资产者，图强求富，追赶现代化的努力。

从这部《中国近代史记》里看到的中国，不只是被侵略、斗争、失败，再被侵略、再斗争、再失败的凄凄惨惨戚戚的中国，而是有希望、有斗争、有成功、有进步的中国；它为现代化的中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给后代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愤恨，也有自豪。

《中国近代史记》的撰写体裁，采用了中国传统史书中的志、传、表等形式，但不同于旧体史书，且分了章节，构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记述体例。

《中国近代史记》是一部创新的历史著作。历来创新总是不容易的。据我所知，此书从构想到成书，经历了一段披荆斩棘的艰难的道路。可贵的是，他们终于走过来了。

古人云：“鉴于先王成宪，其允无愆。”意即按照前人走过的路子走，可能是保险的，不会出什么毛病。不过既然要创新，要开辟自己的路，就不要怕出什么毛病。在创新的过程中出点毛病是难免的。我希望读者们多指出它的毛病来，使它更加完善。我在此强调创新，也不过是要大家把照镜子的历史观稍稍扩大而已。

周谷城

1988年7月22日

## 绪 论

这部《中国近代史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参加撰写者来自全国各地：南起广州，北至哈尔滨，东起上海，西至咸阳。书名则出自一位朋友的主意。去年（1987）8月，湘潭大学于湖南桑植县的天子山召开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我向与会专家学者征求书名的意见，大家都赞成采用这个书名。因此，本书可谓是“五湖四海”、集思广益之作。

我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看法和对《中国近代史记》的构思，幸运地得到了合作者们的赞同，遂以此作为本书的基本观点。由于本书既有各位作者的潜心探索，又有共同的依归，因而是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统一的构成体。

我们之所以要写这样一部书，是因为受到我们论战对方的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的启发。1982年，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二次洋务运动讨论会期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力行老先生特邀我到一位年轻同志的家里，就洋务运动问题交换意见，并展开了热烈而友好的争论。最后刘老先生送我走时，对我说：“希望你们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看你们对其他问题是怎样评说的。”从此，我的脑海里就产生了一个丢弃不下的念头：写一部中国近代史。1983年，在全国史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有的同志说：“按

照现在一些人对洋务运动的看法，中国近代史不是要重写吗？”当时坐在我旁边的几位代表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重写有什么不好！”看来，重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已是持不同观点的同志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后经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催促，在湘潭大学党政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终于正式成立了《中国近代史记》撰写组，这个组由26所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院（湘潭大学、湘潭师范学院、湖南师大、华南师大、汕头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师大、吉林大学、哈尔滨师大、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华中师大、湖南省委党校、益阳师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研究所、广西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福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等）的37位同志组成。

我们撰写这部书，并非完全出于论战的需要，主要还是由于听到历史前进步伐的声音，它驱使我们这样做。这个声音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脚步声而来的。中国现代化是在什么基点上起步？这个基点是要好，还是不要好？它是怎样形成的？中国近代社会在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起了什么作用？是沟壑，还是桥梁？中国现代化事业从中国近代历史中能得到哪些借鉴？这些声音是中国近代史书应该反映的。说老实话，我们希望能有这样的中国近代史书产生，我们等了很久，但现在我们这些本来没有能力完成如此重任的人，不得不进行笨手笨脚的尝试，并且希望这种尝试能有益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撰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书，牵涉到许多问题，我们并不想回避这些问题，相反，我们要借绪论的篇幅就这些问题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看法。

## 一 受自然史制约的人类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sup>①</sup>但是，在马克思前后，都有人对历史的这两方面进行孤立的、片面的考察，考察自然史的忽视人类史，考察人类史的忽视自然史。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考察中，也有不从二者的相互制约出发进行考察的倾向，尤其忽视自然史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制约作用。一些考察中国近代史的人，就像是被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过的那种“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一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活动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象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事实同所谓的历史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sup>①</sup>那么，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什么？近代历史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我们近代史工作者也应该把“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视为自己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并给予应有的重视。考察中国近代历史，也必须从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从生产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资料的活动开始。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人们自身存在的自然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在人类史和自然史的相互制约中阐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离开或者忽视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的近代史著作，不管如何提高阶级斗争的位置，也很难令人相信它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前提。这个工作无疑是困难的。因为，它被前辈们忽视了。而同时代的人，也同我们一样才开始注意它，所以少有可以拿出来的东西。而且，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很少有“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的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我们“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于是，我们的工作就只能是艰难地摸索前行。

## 二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 更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在各种书刊里曾向近代历史人物提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出过许多责难。诸如：为什么不自力更生而去引进洋人的技术？在引进中，又为什么不引进最先进的，而把在西方已经过时的东西引进来呢？为什么只引进洋人的技术，进行枝枝节节的改良，而不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呢？……等等。这些责难曾经是理直气壮的。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也相信这种责难是对的。但是，当我们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之后，再来考察这段历史，就觉得这些责难本身就值得责难。

人们如果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当然是理想的事情。但是这不可能。马克思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sup>①</sup>人们不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而是不自由地继承前人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而且这种生产力也只有通过学习与实践才能把握。人们把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当做原料”来为生产服务，在生产实践中再获得新的生产力。中国近代的人们只能在古代人们已经取得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由被动地继承到不自觉地更新再到主动地创新。中国是在古代社会还在做着尽善尽美的梦的情况下，被世界近代化历史的潮流卷入近代历史轨道上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创造者既不能维持古代社会已经取得的生产力的原样，也不能离开古代社会已经取得的生产力的状况，而且还要迎接西方近代生产力的挑战。中国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采不采用近代生产力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当时，自力更生地发展近代生产力还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要引进近代生产力，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并受到自己的原有的生产力的落后状态的制约。换句话说，历史的发展不允许中国在衡量彼此利弊中自由地进行选择。这样，中国就被迫走上了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生产力的道路。在引进过程中，有些即使在当时人看来都明明是苦果的东西，他们也无法不接受，因为本国生产力的状况太落后了。在西方已是过时的东西，到中国来却还是先进的。而更先进的东西，中国社会反而难以容纳。这样，就不能以为为什么不引进更先进的东西来责难当时的人们了。因为，一方面这决定于西方给不给你最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另一方面又决定于中国本身生产力的配套能力、市场的需要和原材料的供给状况等。因此，选择什么生产力，引进什么生产力，都是不自由的。既然如此，我们的任务就不是责难，而应当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当时人们之所以那样做的深层原因。

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更不能自由地选择社会制度。每个人都想过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他能不能过美满的生活，能过什么样的美满生活，这并不是他随心所欲所能选择的。不然的话，我们中国早就过上“大同”的社会生活了，因为远古的中国人就提出过“大同”的理想社会，不致于到了两千年之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还在以此“大同”社会作为理想来追求。社会制度的出现及其性质，均受社会生产力状况的制约和决定。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 [commerce] 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

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sup>①</sup>既然如此，那末，中国近代社会究竟能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阶级组织、什么样的政治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从后人的需要、成见或什么“永恒正义”出发，而应该从如实地考察当时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出发，应该去考察在这种状况之下，究竟能设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建立什么样的阶级组织，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国家。对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人们曾提出过何其多的要求与责难，但是，如果采取上述观点来考察它们，所得结果又该会多么不一样啊！要求洋务运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行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显然不行，甚至以同样的要求去衡量几十年以后出现的维新变法运动，也不切合实际。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能实现这种要求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状况。

### 三 历史任务是历史本身提出的

我们认为，既然人们没有选择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自由，那末历史学家也没有给历史人物派给历史任务的自由。蒲鲁东曾经想拥有这种自由，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他“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sup>②</sup>

历史任务是由历史发展本身提出的，与此同时历史既提供完成这种任务的物质条件，也提供完成它的领袖，英雄和群众。人们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321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2页。

的任务在于研究历史，正确地认识历史赋予自己的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所必备的条件，并正确地运用它们。历史无疑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人们只能依据物质条件来创造，只能“靠他们垂死的世界历史上历来所创置的产业”来创造，如果条件不备，就必须首先创造这种物质条件。历史家不能只注视那些为新世界冲锋陷阵的人，而忽视那些为创造新世界而首先创造它依存的物质条件的人们。

创造历史条件的人们当初不完全明瞭他们创造的意义，不一定把自己的创造和创造一个新世界联系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以往的历史创造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是自然的过程。创造者的主观动机同他创造的物质条件所引起的后果甚至是完全不一致的。斯大林曾经用这种观点分析了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和俄国资本家的最初的创业情形。他说“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时期开始建设大工场手工业企业，同行会小作坊并存，从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它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不但会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家政权，而且会打倒它的优秀人物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当时资产阶级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的费用，把更多的商品投到亚洲市场和刚发现的美洲市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机器化大工业，丝毫也不触动沙皇制度，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严重增长会引起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

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重大的飞跃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想要极端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资本家，并且从国民经济中汲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日常的狭隘实践的利益。”<sup>①</sup>

洋务派竭力在中国培植近代机器化大工业，不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不仅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而且还为清政府镇压农民的反抗卖尽力气，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严重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枝枝节节”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样两个新阶级产生和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一定的物质的和阶级的条件，这个革命不但要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清王朝封建政权，而且要打倒它的部分人物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当时他们只是想要尽快地发展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自强御侮，堵塞漏卮，与外国资本家分利，——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是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俄国的资本家，中国的洋务派，它们为新社会创造物质条件时，虽然没有什么崇高的远大目标，但它们创造物质条件的实际的历史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历史任务由历史本身提出，完成历史任务的物质条件和伟大人物由历史本身创造，人们往往是不知不觉，甚至是以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方式完成历史任务的，这是人类进入自由王国以前的

<sup>①</sup>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5～656页。

历史事实。“其实，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sup>①</sup>历史家的智慧不在于为过去的历史添油加醋以迎合某种口味的需要，而在于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实际进程，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科学的抽象。

#### 四 历史正当性

恩格斯说：“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sup>②</sup>在中国近代，奴隶主已经过去，而封建主却还存在，它充当人类发展的杠杆的那个有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是否已经结束？它的历史正当性什么时候开始消失？这要看它同生产力的关系。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有一种新的生产力引入中国社会。这种生产力无疑同封建生产关系是格格不入的，但要使封建生产关系不让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既然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使生产关系进行这种变更的程度，那末就要承认封建生产关系的某种历史正当性，从而也要承认它的上层建筑的某种历史正当性。它的这种历史正当性只能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消失。所以对于近代前期的清王朝封建制度还不能以一个“反动”笼统地骂倒。对于清王朝政权也应结合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对于封建专制，洋务运动不触动，戊戌变法提改良，辛亥革命实行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57～558页。

翻，这种差别，是历史的差别，不是当事者谁高明不高明，而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历史正当性的失去。因此，对于当时人们的那些出于义愤的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也应当进行分析。“道义上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同样我们不能以义愤作为判断历史正当性的依据。

在中国近代史上，承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正当性，是一个最重大的问题。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常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sup>①</sup>资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体现者。“资产者在自己还没有爬上统治地位的时候则是革命的。”<sup>②</sup>在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地主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官僚与资本相结合，以及资产阶级在爬上统治地位以前的改良要求，或者革命要求，等都具有历史正当性。由于中国近代生产力发展落后，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甚至到解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也没有完全消失。恩格斯说，“正象马克思尖锐地、着重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态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一切社会形态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2页。

就是被压迫的工人群众。”<sup>①</sup>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历史意义之大。

### 五 近代机器是最危险的革命家

中国封建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基础，虽曾这样那样地遭受革命的破坏，但如马克思所说：“经常以同一形式全新恢复起来，他们被破坏了，又在原处用原有名称重新产生。”为什么？因为这只是一种外加的破坏，而不是内在的瓦解。内在的瓦解是使农业与手工业相分离。谁能使它们分离？正是机器。只有机器才能完成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sup>②</sup>。中国近代社会不引进机器，不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中国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是无法改变的。中国近代许多志士仁人，为了推翻封建专制，抛头颅洒热血，精神可佳，但是忽视了中国生产力的落后状况，不明瞭一切历史运动成败的最终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马克思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sup>③</sup>引起革命的机器，比革命家更为危险。革命家如果不重视自己立足的物质基础，不重视机器工业的发展，只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打主意，以图改变旧社会建立新社会，那是徒劳的。“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6页。

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页。